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4.0549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

姜英华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技术与资本最大限度的联袂合谋将人们推入数字化生存境地, 数字技术最广程度地渗透和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过程、消费模式和交往范式。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催生了技术的晦暗面和技术异化, 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剥削循环、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和社会交往的虚拟泛化, 将人类社会置于技术依赖和数字化生存的困境。消解技术异化和超拔技术生存困境, 需要深刻检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 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拆解和打破资本对技术的调用以及技术与资本的联姻, 重塑自由劳动过程、归正消费需求取向和复归社会交往真谛, 从而使技术朝向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服务。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资本逻辑; 技术依赖; 技术异化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24)02-0001-07

数字资本主义的商品化、竞争、价值增殖和积累几乎已经席卷和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节奏和整体图景, 将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推至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同时, 任何徽章都有反面, 资本与数字技术最新形式的合谋, 还造成了数字技术的晦暗面和异化, 引致了整体性的数字化生存困境。消解技术异化和超拔数字化生存困境, 需要深刻反思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 指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异化的根本致因。在此基础上, 根除技术异化的根源, 翻转技术发展方向, 推动技术朝着服务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一、异化探源: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异化的本质逻辑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一种动态的、整体性的、矛盾性的社会形式。”^{[1]403} 作为一种殊异于其他要素和社会形式的社会关系, 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最大化和永恒化。竞争、动态的竞争关系既是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最大化和永恒化的工具和手段, 也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最大化和永恒化的障碍和阻力, 而支撑竞争消解或成就资本增殖优势的背后真相就是技术和动态化的技术变革。技术的创新和效率原则满足了资本对“价值生产率”和价值增殖空间最大化的吁求, 因而成为资本寻利最有力的杠杆和支撑。而被马克思视为将机器技术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背后驱动力的残酷的经济必然性的正是资本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以维持竞争力^{[2]79}。对技术而言, 技术的意向结构规定了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 形成了技术的应用逻辑^{[3]9}, 这一科学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技术中性论”的错误主张。机器和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实体, “它们是用于特定生产机制的生物政治工具, 这种生产机制为某些特定实践提供便利, 同时阻碍其他形式的实践。”^{[4]153} 同时, 机器和技术本身也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由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塑造”^{[5]101} 的力量, 对技术本质的理解, 既应该剖析技术的属性和意向结构, 也要将其“放置于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中”^{[6]260} “明确它是谁的工具, 它的目的是为谁服务。”^{[6]261} 这就回到了资本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来, 追求价值增殖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对技术的调用, 而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又规定了技术的价值取向和应用逻辑,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马克思指出, “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 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

收稿日期: 2023-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技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1XKS018);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1lzujbkydx046)

作者简介: 姜英华(1984—), 女, 法学博士, 副教授, E-mail: jyh@lzu.edu.cn

的!”^{[7]508} 资本对技术的征用以及技术效率对资本价值增值的成全,使资本与技术的联袂勾结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大议题和最显著的特征。

技术并不单纯意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面,而是“内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本质。”^{[5]508} 技术是承载不断改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和支撑点,技术嬗变不是一次性的、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连续性的、持久性的历史过程。因而,对数字资本主义特殊性的理解,也必须将其“置于持久的结构性趋势和历史危机趋势中加以审视,而不能假定与后者相脱离,或推断数字资本主义脱胎于后者。”^{[5]100} 具体而言,在前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即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技术机器形态,在这一存在形态中,一方面,资本第一次将科学技术直接并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通过科学技术强大的创新力和推动力,“资本的生产力”借由占有“一般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而得到了对抗性和悖逆式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机器体系中的资本意志和主人权力与普通工人的贫困状态和仆从现状之间的对比是赤裸裸的、直观的和不可接受的,工人接续不断的罢工运动是这种对立和对抗最真实的写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阶到崭新阶段,这一更高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资本与技术更紧密、更隐秘的内嵌融合。资本与技术的深度联袂合谋,不仅维持了资本在经济领域的至上权力,更重要的是,两者还合作征服和涵括了包括政治、文化、劳动、消费和交往的一切场域。技术晋升为“一种形成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的总体性力量。”^{[2]99} 这种总体性力量既为资本的总体性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撑,也证明了资本和资本统治越来越成为复杂精巧的机制,越来越具有幽灵化的隐性集权特征。

资本的上述特征一直延续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并在技术进步和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变装、巩固和强化。一方面,资本价值增值的本质并没有变,只是价值增值的工具和手段更加精巧和隐秘化,资本向数字化和网络领域的投资开发看中的正是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发财致富的商机和价值增值的无限潜力。于是,资本用“对网络(network connectivity)连接性的占用和专有”^{[8]13} 代替了对机器所有权的独占和私有,数字化技术接替以往的技术形式成为数字化时代隐匿的、幽灵化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和巩固资本统治的强大引力。数字技术为资本价值增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为普通的个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技术依然是异化的技术,技术异化维持的数字资本主义依然是具有极权性质的统治。具体而言,大数据、网络、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具体样态虽然为人们提供了诸多的消费、运输、通行、交往、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方便,但是,归根结蒂还是服务于资本价值增值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摄下的数字技术本身对绝大多数社会大众来说依然是外在的 and 对抗的神秘力量。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社会运转速度不断加速、劳动工作强度不断增加、休闲娱乐时间不断被侵占,与工业时代的工人相比,数字时代的零工、“一次性员工”“全职临时工”等几乎完全失去了与资本、平台讨价还价的机会和能力,人们在自由化时代获得的自由只能是资本价值增值框定下的有限度的自由。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已经成为一种与人绝缘并反对和压制人的强大力量。更有甚者,由于数字技术的设计“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9]84} 所以,今天,人们依然还遭受来自资本独裁和集权式的操持和控制。尽管数字技术伪装和掩盖了资本的剥削本性,但同时,网络化和数字技术也编织了无以逃遁和无法抗拒的资本统治的天罗地网,表现为“(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b)它无所挣脱,所有主体都会受其影响;(c)它无处不在,亦即它的影响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当中某个或某些领域,而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批评或反抗它。”^{[9]84} 要识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技术异化的治理术,除了对资本和技术的关系和本质进行厘清之外,还需要对资本统摄下技术异化的整体面向进行指认。

二、异化面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异化的立体呈现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人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0]70}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对资本统治的支撑以及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裹挟浸润首先就体现在劳动过程和劳动领域方面。

(一) 技术异化与劳动过程的剥削循环

任何劳动都是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展开的,技术异化必然导致劳动的异化。

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广连接性和强容纳性,不仅使原本由于地理区位阻隔而相互孤立的劳动活动整合为一个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也使“以往因为劳动分工而彼此互不连属的生产部门,被网络整合成集体协作的生产过程,”^{[8][13]}从而形成了数字化的社会大生产循环。具体而言,首先,数字技术激发劳动范围的全域化开发。工业时代,机器设备的替代作用使除了成年男工之外,女工、童工等不同形式的劳动力甚至前现代闲散的劳动力都转化为为资本效劳的劳动力。数字化时代,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中介作用,将自身的增殖和再生产过程升级为开放的、“无边界”的社会生产关系。传统劳动在网络平台“无实体规模化”的媒介下,搭建起资本对劳动统治的“无距离”的超链接形式。借由此,传统劳动过程被最大限度地吸纳进资本的势力范围,并被资本增殖的“异己规律”所同化和吞没。数字技术还催生了“生命政治劳动”“受众劳动”“产消者劳动”“免费劳动”等将主体的情感交流、消费、游戏、休息和娱乐、休闲等日常生活活动转变成成为资本增殖效力的新型劳动类型。所有这一切,将劳动范围极限泛化到“至大无外”的境地。与工业时代一样,信息技术“无上限、无止境”的互联互通作用满足了资本“无边界、无极限”的增殖欲求,而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也在“无边界”和“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中更加失去自我和自我对劳动条件的支配和占有。

其次,数字技术统筹劳动时间的全天候在线。一昼夜24小时都占有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7][297]}在数字化时代成为现实。数字技术消解了传统固定化的“生产时间”与“消费时间”的边界,消弭了死板机械化的“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打通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而且还把人们用来审美和休闲的闲暇时间全部置换为工作时间^[11]。睡眠时间的减少和移动办公设备的24小时在线,终结了业余和自由休息的时间,剩下的只有由数字资本导引和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受制约的劳动时间。

最后,数字技术促进劳动形式的全方位统括。“无酬数字劳动者、高收入和高压力贵族知识工作者、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人、泰勒制呼叫中心雇佣工人、泰勒制硬件装配工和制造者、奴隶采矿工人和其他工人,”^{[12][386]}构成了全球总体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曝露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关联的劳动形式和劳动结构。最主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架构的层级分明的劳动结构和劳动过程中,既有奴隶采矿工人似的传统的资本剥削和劳动异化,也有像无酬数字劳动者和贵族知识工作者似的新型的资本剥削和劳动异化。就传统的劳动异化形式而言,专断、恐吓、强制、威胁和屈从、痛苦、失去、非现实化是其最重要的表征,而就数字型的劳动异化而言,自由、精明、友好、诱惑和激励、迎合、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是其最有效的剥削手段。强制我劳动并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消失不见了,相反,干劲十足的自我强制和心甘情愿的自我剥削成为数字时代资本隐秘而艰险的逻辑,而数字劳动异化也表现为“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13][57]}虚假的自由和自我实现还消弭了劳动者的所有反抗,资本隐匿地扩大和再生产着异化、非自由和不平等的生产劳动关系。

(二) 技术异化与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

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加速并不指向人们的真实需要和真实需要的满足,相反,技术被资本调用以满足资本价值增殖和不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由此造成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

首先,技术加速——用速度打败速度的过度更新。在前现代社会,东西的消费和使用是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因此,“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9][61]}资本开启的现代社会则完全相反,基于使用价值的消费让位于基于消费价值的商品交换,资本对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欲求要求资本不断提速生产节奏和缩短流通时间,这种不断的提速和加速产生了一种商品的“丢弃结构”,即“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人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9][61]}所谓的技术变革和技术更新的目的早已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快捷便利,而是为了制造产品创新的消费噱头和增加商品销售的附加值,比如,以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智能终端设备,刚拿到手或者还没拿到手就已经被宣告“过时”了。资本不

断用技术加速度淘汰自己的商品,用自我革命的方式增加商品销售额和加速资本自身的运转。

其次,技术推荐——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智能推送。数字化时代,消费场域慢慢由实体店过渡转移到各大网络直播和购物平台,由此形成了数字化的消费习惯。大数据比人们自己更能毫无遗漏地读取、记录和积累人们的浏览足迹、购物痕迹甚至是具体的时间日期,这样,“人们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都会被存储下来。网络上的每一步都被监视和记录。人们的生命,在网络上被完整地临摹出来。数字化的行为习惯,准确地刻画出人们外在和内心的图像,这比我自己刻画自己要更加全面、准确。”^{[14]84}在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打磨下,人们由生动复杂的消费个体变成了简单均质的数字人和消费数据,网络的数字化记忆不仅能刻画出人们的数字化形象,更能通过每时每刻的数字监控对人们的行为举止、浏览偏好和消费习惯进行准确的预估和研判,在消费者进行网页浏览和商品购物时适时地提供相似商品、组合商品和满减诱惑等智能推送,大数据不费吹灰之力在润物无声中操控和引导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and 自由意志,大数据终结了消费者的自由意志。

最后,技术便捷——让高效更加高效的数字化支付。“去纸币化”的数字化便捷支付使人们对现实的货币失去了触感和真实的感受,“忘却的记忆”刺激了人们情绪化消费和冲动购买的欲望。网贷等网络贷款形式和数字化支付方式使很多人不顾自身实际收入和现实偿还能力而陷入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透支性消费的陷阱。由于一些商品的符号价值具有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和指认功能,因此符号化的炫耀性消费也使很多人陷入非理性化奢侈消费和虚假消费的泥潭,甚至形成消费依赖和消费成瘾,迷失在资本编织的消费景观之中无法自拔。消费已经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规训的有效形式。“今天,人们不再为自我需求而是为资本去工作。资本产生的是它自己的需求,人们却将此误认为是自己的需求。”^{[14]9}这其中,正是虚假过溢的消费和补偿性的满足替代了人们真实合理的需求,并使人们错认资本的需求为自己的需求。

(三)技术异化与社会交往的虚拟泛化

技术异化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产生了超越时空限制的数字化虚拟交往,引致了社会交往虚拟泛化的消极后果。

首先,数字技术的交互性和超链接使物理空间的远距离在社会交往中越来越不显眼和越来越不重要,数字化时代,“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联。”^{[9]58}甚至可以说,数字技术改写了物理空间的概念定义,它使物理空间的远距离战胜了社会交往关系的近距离,人们常见身处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的人们之间的静默和疏离,却执迷于数字化虚拟世界或与另一时间和相异空间的人们进行着热切和沉浸的虚拟交流。一种“远在天涯却近在咫尺”的虚拟交往和“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现实交往形成惊人反差,更有甚者,前者还远远超过和战胜了后者,成为人们普遍偏好的交流交往形式。

其次,数字技术的虚拟化和沉浸式利用自由的幌子鼓励人们以自我展示和自我曝露的方式参与到数字化网络世界的建构中,形成了数字化的“超信息”和“超交际”的透明社会。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虚拟化、美颜化和沉浸式激发了人们对于理想人物和交往模式的无限憧憬和遐想,引发了个体对自我魅力和自我完善性的虚拟自信,人们留恋于数字化虚拟空间编织的完美童话世界,而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在真实社会关系中出现的“瑕疵”显露出不耐烦和无法忍受的极端态度,人们疏于现实的语言交流和情感维护,“死宅”和“群体性孤独”成为数字化时代社会交往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和全景在场“造就了经济上的全景监狱(Panoptikum)。它所追求的不是心灵的道德净化,而是利益和关注度的最大化。完全的照明带来的是完全剥削。”^{[15]75}透明社会和全景监狱带来的不是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资本需要的“自我约束”和“极致剥削”。

再次,数字技术的时空消融能力扩充了个体社会交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就时间性而言,24小时“时时在线”和“错时回复”为远距离交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交往的密度,“由于时差的缘故,远方的朋友可以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回信,因此感觉上反而好像离得更近。”^{[16]174}就空间性而言,数字网络打破了个体实践范围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从而将个体交往的范围布展到世界上任

何一个数字网络覆盖的角落,从横向的空间范围上增加了交往的广度,由此,“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并带来了格尔根(Kenneth Gergen)所谓的‘饱和的自我’。”^{[9]58-59}

最后,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中的广覆盖和强应用使无法触及和使用数字化智能设备的人群在社会交往中处于被疏离和被排斥的边缘境地,产生了数字化交往中的弱势群体。更严重的是,在数字化交往方式强势进军的今天,个体生命更多地显示为数字化符号,而不拥有数字化智能设备就意味着其个体生命有时候是无法显示的,这种数字化和大数据的“弱显示”或“不显示”不仅限制了人们现实的工作、出行和生活、医疗等行动,最重要的是,这种个体生命活动在资本统筹和监控之外,无法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范畴,因而不受欢迎和不被允许的。

三、异化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异化的超越扬弃

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网络最初被作为具有无限前景的“无摩擦”的自由媒体而大受吹捧和赞誉。时至今日,数字化网络的运行逻辑和行为结果证明最初的热情和兴奋不过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劳动过程变成了自我剥削的强化循环。自我展示和自我曝露的交往过程变成了自我剥夺的全景监控。自主选择和自我沉浸的消费过程变成了自我确证的扭曲过程。数字技术形成了新的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引发了新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宰制,造成了新的技术权力和技术排斥,由此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技术异化图景。超拔和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需要从资本根基和技术逻辑以及二者的联袂媾和入手,消除技术异化的根源,遵循技术向善的原则,树立技术自觉的理念,进而构筑超越技术异化的可能路径。

(一)超越资本逻辑,废除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除技术异化的根源

由于技术的开发顺从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因此,技术开发集中于资本增殖的高利润和高风险的虚拟经济领域和游戏开发方面,而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真正的物质消费和实体经济等周期长和回报率低的诸多领域则被高挂悬搁。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技术和数字领域只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增殖新的领域,最大化增殖是资本技术投资的唯一目的。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交换价值规律支配着数字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被冠之以“共享经济”头衔的经济却沦为“资本专享”,数字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实质是为资本寻求高利润的投资领域而不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共享。部分数字商品使用权的共享并没有撼动和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不平等关系,数据生产资料 and 平台的所有权依然牢固掌握在数字资本家手里。由于生产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数字资本和平台经济产生了吊诡的问题,一方面,数字内容的生产者并不享有内容生产的所有权好处,数字内容的生产者和发布者是在被分配的虚拟土地上耕作自己互联网作物的数字佃农,他们的数字展示和数字交往行为成了为资本赚取利润和赚钱的免费行为^{[17]38}。另一方面,数字内容生产者像一个大的蓄水池中的水滴,生产者的分散化和小众化以及个体内容价值的微量化和生产总体的海量化和数字平台成长的集中化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大数字资本并吞小资本和大数字平台挤压小数字平台,使得大数字资本和垄断平台与小数字资本和小平台之间反差极化日益扩大。

超越资本逻辑,不是对资本采取大拒绝的消极片面态度,而是要既约束规约又利用超越,约束和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同时放大和利用资本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扭转和颠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分裂疏离的关系,废除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坚持数字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数字内容的享有者,坚持“一般数据”和数字生产资料的共建和共建,遏制数字生产资料的独占、专有和垄断,防止大数据平台的恶性竞争和自然垄断。同时,建立和完善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相关的法律法规,防止数字资本家和网络平台通过强制同意条款对个人数据进行无偿占有和非法侵占。另一方面,限制和防止资本在数字化投资领域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规约资本,使其朝向有利于提升物质生产率和壮大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向发展,用资本和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引领其朝向有利于满足和提升人民美好生活品质的方向发展。

(二)强化技术反思,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技术权力的宰制,遵循技术向善的原则

在数字技术与资本互动和一体化建构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表现为技术所有者制约、控

制和支配他者的强制性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按照数字技术的规则、程式和机制运行,数字资本的所有者依据数字技术获取更多的支配和控制权力。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包罗万象的复杂结构隐匿地承载了资本统治的所有秘密,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技术分析就会发现,“数字技术几乎可被视作对自动化、剥削与合理化诸原则的强化,例如,对电子绩效监控系统的采纳正在进一步强化有关生产率、劳动分工与剩余价值等诸多泰勒式思想。”^{[18]904-905}数字技术不仅巩固和强化了已有的强制和合理化原则,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力跃迁和物质财富极大丰裕以及人们生活舒适范围极大扩大的基础上,技术的媒介作用还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其他重要维度统统纳入数字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制度框架之中,并用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成就拒斥一切可能的、优化的历史替代性选择和方案。数字资本主义用把技术进步包容在制度框架中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发展节点和瓶颈期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弹性空间,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就是技术的形式^{[19]9}。不仅如此,技术无处不在的渗透力还将人们置于一种普遍病态的技术依赖之中,就像无产阶级只能选择不同的资本家却不能脱离对整个资本家阶级的依附一样,今天,人们也可以摘选不同的数字技术和智能产品,但对整个数字技术却无从拒绝和无法回避。人们像吸毒者过度依赖毒品一样地过度依赖着技术和技术应用带来的省事、便捷和效率,失去数字技术的协助,人们就像失去肢体和空气一样陷于“去技术化”的技术恐慌和技术焦虑之中。数字技术没有带来人类适应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的提升,其替代作用反而降低和侵蚀了人类机体本来的学习、生存和进步能力,对数字技术长期的沉迷和过度依赖很可能使人类丧失独立思考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机会。

超越技术逻辑,不是要退回到落后的前技术世界,而是要将技术从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解放出来,消解技术权力对社会的操控和宰制,扭转数字技术异化对人的个性、能力和自主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的扭曲抽取,将人从对技术过度依赖中解放抽离出来,在以人为本的崭新目标下激发其服务于人的正向潜能和新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遵循技术发展的向善原则和方向,它“将提供一种对生活机会的扩大,减轻工作的苦痛和困难,抵御自然灾害,征服疾病,改善社会安全状况,扩大联络,增加信息,扩大责任,大大地增加了与精神健康相和谐的物质繁荣,消灭自然、文化和人的异化。”^{[20]382}也将为崭新的文化解释、多面性的工作、人的创造性和自由实践提供新的可能和余地。

(三)培育自主意识,破除技术意识形态自由的幻觉假象,树立技术自觉的理念

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空间开放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制造了一种“无摩擦资本主义”的假象,好像数字资本主义统摄下的数字技术是“普遍的、中立的、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18]912}由此借助于数字技术和技术异化,使人们在劳动、交往和消费中的受控制和不自由遮蔽化甚至合理化。对于劳动过程而言,看似平台为分散化的劳动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工作岗位和弹性的、可选择的工作方式,使他们可以自己管理时间,并自主而自律地填充空闲时间来增加收入。这种灵活化、自由化和绩效激励式的工作收入方式,消减了人们对强制同意和平台控制的反感,数字资本和平台通过迂回的方式巧妙地使人们忘却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21]50}对于虚拟交往而言,看似数字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展示和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人们可以在轻松愉悦和舒适放松的氛围中享受多元化和丰富化的社交活动,并在众多的注意力和点赞中获得自我确证和自我满足。人们沉浸在数字网络带来的感官快感和精神愉悦之中,却不知道数字技术通过玩弄交际与商业以及自由与控制的辩证法,来对大众实行比任何外来剥削和有形统治都更高效、更自由的自我剥削和无形监控,大众心甘情愿的交付和毫无保留的奉献证明了这种自由的辩证法正是监控社会的基础^{[15]82}。对于消费需求而言,数字技术将资本要求的高速循环精巧地转化为各种消费模式,数字技术通过刻画消费者的数字化形象,精准地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准确地预估和研判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消费者每一次的自主选择 and 自由消费都离不开大数据和网络平台,自由的消费者实则是数字技术治理下的提线木偶,自由的个人消费实则是不自觉的个人洗脑和自我消耗。数字技术打造了一个肯定性思维的宽容社会,而宽容只是强制的代名词,宽容的代价必然“是被技术社会那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19]179}

隐形的意识操控和被操控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大的隐忧，它去除了主体自身的否定气质和反抗意识，这句话同义于人们认为已有的数字资本主义模式理所当然和不可超越。刺破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迷雾，需要培育数字技术批判的自主意识，增强反操控和反渗透的数字思维和辨识能力，利用数字技术增强高质量供给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对“现实的人”的关注以及扩展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真正交往，制定技术规约和法律制度，强化数字技术和数字空间治理，营造健康、和谐、向善的数字空间氛围。同时，认清数字技术的真相和应用限度，不断促进和丰富自我实现的劳动、自主选择的消费和健康和谐的人际交往关系，最终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莫伊舍·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 [M]. 康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2] 罗斯·阿比奈特.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M]. 王维先, 马强, 嵇明亮,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3] 吴国盛. 技术哲学讲演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4]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文森特·莫斯科. 马克思归来: 上 [M].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 [M]. 张寅,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 [6] 丹·席勒.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 网络与尼克松时代 [M]. 翟秀凤,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8] 丹·席勒. 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M]. 吴畅畅,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 [9] 哈特穆特·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 社会批判理论大纲 [M]. 郑作或,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0.
- [11] 姜英华. 数字资本的时间变构与时间规训及其异化后果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 11-19.
- [12]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 [13]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 [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14]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15] 韩炳哲. 透明社会 [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 [16]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范海燕,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
- [17] 尼古拉斯·卡尔. 数字乌托邦 [M]. 姜忠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18]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文森特·莫斯科. 马克思归来: 下 [M].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9]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20] 舒尔曼.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 在哲学深层的挑战 [M]. 李小兵, 谢京生, 张峰, 等,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21] 迈克尔·布若威. 制造同意: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M]. 李荣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On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JIANG Yinghua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Entering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maximum synergy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has pushed people into a digital survival situ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and infiltrated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o the fullest extent, changing people's labor processe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use of technology by capital and the collus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have given rise to the dark side and alienation of technology, resulting in the exploitation cycle of labor processes, the false overflow of consumer demand, and the virtual generaliz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s, placing human society in a dilemma of technical dependence and digital survival.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ultra-high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abolish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dismantle and break the capital's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rriag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reshape the free labor process, normalize consumer demand orientation, and return to the true ess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so as to make technology serve the direc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capital logic; technical dependenc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责任编辑:伍甬]